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编

福建宣传文化的个体记忆

系 历

第二辑

『星闽日报』三年追忆

『福建日报』创办初期的老领导们

关于田埂豆的一次调查

福建文坛的三位老人

从冰心研究会到冰心文学馆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编

亲 历

福建宣传文化的个体记忆

第二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历：福建宣传文化的个体记忆．第二辑／福建省
炎黄文化研究会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211-07484-6

I. ①亲… II. ①福…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0396 号

亲历——福建宣传文化的个体记忆（第二辑）

QINLI

编 著：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责任编辑：满 艺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fjpph7211@126.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福州诚信达彩印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新店镇健康工业区 15 号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22.25

字 数：276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1-07484-6

定 价：4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前 言

根据省委领导的要求，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从2015年年初起，在省委宣传部的支持和指导下，倡导全省宣传文化系统老同志开展整理史料和撰写回忆录的工作。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研究会陆续收到了100多位老同志精心整理、撰写的史料和回忆录。我们从中挑选，编印了《亲历——福建宣传文化的个体记忆》（第一辑）、（第二辑）。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发动更多的老同志参与到此项工作中来，同时视来稿情况，继续分辑出版。

撰写宣传文化工作回忆录，是一件不轻松的事，但也是总结经验、资政育人、提高宣传文化战线水平和素质的好事。选编在《亲历——福建宣传文化的个体记忆》（第一辑）、（第二辑）中的这些文章，虽然着笔的角度各不相同，但多以我省宣传文化阵地的重要史事为重点，以本人亲历、亲为、亲见为主轴，文字流畅顺达，所述鲜为人知，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借鉴作用。当然，由于日久年疏、各人视野局限，虽作者和编者都力求客观真实，但挂一漏万，偏颇之处在所难免，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

2016年9月

目 录



《星闽日报》三年追忆/游德馨	001
《福建日报》创办初期的老领导们/王仲莘	011
和父亲贾祖璋在一起的日子/贾柏松口述 张文良整理	045
福建文坛的三位老人/黄文山	050
我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点滴回忆/林德冠	066
从媒体焦点看福建农村改革发展亮点/魏章官	074
福建对外、对台宣传的若干回忆/张元锦	091
闽北农村建立宣传网络的实践/杨运樟	112
“武夷之春”及其他/庄春江 林亚萍	118
我们的冯梦龙研究琐忆/陈吕白 王 凌	124
我经历的福州新闻媒体的拓展历程/林爱枝	136
宁德地区宣传教育中心的创办实践/陈济谋	142
从冰心研究会到冰心文学馆/王炳根	152

“福建艺术扶贫工程”的起步与发展/吴志跃	173
大陆音乐学术界首次访台散记/王耀华	189
我与台湾出版同仁的交往/杨加清	216
一九九二年：台湾采访/周景洛	226
本世纪的两次赴台展览/郑国珍	230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活动中的交锋/黄建斌	235
关于田埂豆的一次调查/马照南	249
江坊村扶贫琐记/金学渊	253
《聊斋》系列实验工程/俞月亭	258
电视连续剧《郑成功》的创作与拍摄/蒋夷牧	288
回眸当年闽江写生活动/陈玉峰	293
我与升国旗仪式的改进/张木良	308
亲历电影《天狗》的拍摄与宣传/肖 锋	314
福建土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纪实/宋闽旺	345
我在毛里求斯“过大年”/陈 朱	347

《星闽日报》三年追忆

游德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想独吞胜利果实，围攻解放区，发起全面内战，在其统治区内实行新闻封锁、白色恐怖，与人民所渴望的和平、民主背道而驰。这时，华侨企业家、报业家胡文虎计划在福州办《星闽日报》，由其族亲福州永安堂总经理胡梦洲任社长，聘请他的永定同乡——上海大夏大学毕业，曾在他的星系报纸工作过的老共产党员郑书祥（当时与党暂时失联）任总编辑。在这之前，经过其同事余志宏、王元（均为中共党员）介绍，与中共闽浙赣省委候补委员、城市工作部副部长孟起相识。他们共同研究了如何用“白皮红心”的立场长期占领《星闽日报》这块阵地。

国民党反动派对《星闽日报》怕得要命、恨之入骨，怕它揭开他们的疮疤，恨它把丑闻晒在光天化日之下，采取监视、威胁、诽谤、逮捕、绑架、停刊等办法进行摧残。由于贯彻了隐蔽的办报方针，加上总编辑运用高明手段，《星闽日报》一直坚持到福州解放，前后共两年多。

孟起、郑书祥是20世纪30年代优秀共产党员。他们理想坚定、意志坚强，对党忠诚、热爱人民，知识渊博、谋事实在。在国民党宣布“戡乱时期”的白色恐怖下，他们共同策划如何运用国统区的公开报纸为我所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受到了百姓的欢迎。报纸发行量大幅提升，是当时福州其他报纸发行量总和的两三倍。不少人以《星闽日报》为风向标来揣测时局。

孟起同志是我党优秀的领导干部，1949年初就义于南京雨花台。他于1938年入党，担任过中共沙县工委书记、福安县委书记、闽浙赣区党委候补委员和区党委秘书处、社会处负责人，以及中共闽江工委宣传部部长、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副部长。



孟起

他有办报刊的经历和经验，主编过《教育月刊》、省委机关刊物《锻炼》。在“三青团”主管的《南方日报》闽东版任主笔期间，他的党内职务是中共福安县委书记。这个“白皮红心”的书记，巧妙地撰写文章、评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如在该报副刊《铁花》上刊登对联“救国岂无人，杀敌冲锋，有彼壮士！发财自有道，居奇囤积，舍我其谁？”矛头直指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国难财的官商。福安县赛岐镇查缉所所长章吴绎，秘密身份是闽东七县军统情报站站长，是戴笠的嫡系。此人在当地称王称霸，无恶不作，借缉私之名行走私之实，贩卖私盐牟取暴利。报纸予以揭发并配发评论《缉私者走



福州中平旅社旧址，原南方日报社址

私》，揭露国民党反动官僚监守自盗的种种丑恶现象，读者看后无不拍手称快。当时该报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反映抗日战争国难当头，前方战士浴血奋战、处处吃紧，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

却出现“公务员谈天说地，乡镇长花天酒地，保甲长欢天喜地，老百姓呼天叫地”的畸形社会现象。孟起在报端用答读者问的形式，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当局政治腐败的根源所在。经过一年左右的艰苦努力，孟起不但完成了中共福建省委交给他的恢复发展福安党组织的任务，上层统战工作和社会救亡运动也取得可喜成绩，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忠诚于党、能独立开展工作的干部，表现了他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以及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任务并取得成功的独立领导能力。这一段时间，他通过《南方日报》闽东版主笔工作，取得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隐蔽、打着“合法”的招牌办报纸的经验。这些为他以后指导办《星闽日报》起了很大作用。

二

胡文虎祖籍福建永定，是爱国华侨，1935年9月1日在厦门创办了《星光日报》，这是继新加坡《星洲日报》、汕头《星华日报》之后星字号的第三家报纸。由于有数位共产党员在《星光日报》任编辑，因此该报经常刊载一些反映人民意愿、宣传爱国抗日等的进步文章，令人耳目一新。永定籍青年郑书祥，在中学、大学时代曾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受进步思想熏陶，对国统区社会现实产生了强烈不满。他进入《星光日报》担任副刊编辑后，仿佛像呼吸到清新空气一般，精神为之一振，不时在《星光日报》副刊上发表一些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进步的文章。在鲁默、克里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郑书祥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逐渐有了参加政治活动和加入共产党组织的要求。1935年冬，经尹林平、鲁默两人介绍，郑书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其他共产党员一起成立实艺研究社，创办《实艺》周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开展“鲁迅精神不死”“中华民族永生”的悼念鲁迅先生的活动，公开成立厦门文化界救亡协会。它是中共厦门市委直接领导的文化

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是福建省第一个公开的抗日救亡组织。

1938年5月日寇侵占厦门，《星光日报》停刊。郑书祥遵照党的指示转移去香港，经廖承志、连贯安排进香港《大众日报》任主笔兼电讯编辑，继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协助爱国青年华侨回内地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他和乔冠华分别担任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即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前身）香港分会的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底日本侵占香港。党组织指示共产党员自行疏散隐蔽，并每人发给200元港币作疏散费。郑书祥回到福建。1942年他受聘于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以下简称音专）任文史教员，经常给学生作抗日形势报告，组织学生学习鲁迅作品以及其他进步书籍，在进步学生中传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营救、声援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的学生，成为音专进步力量的核心。1944年起，他与羊枣一起担任永安《民主报》（进步文化报纸）社论主笔，同时也是《联合周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发表了一些国际时事与战局评论和揭露旧社会黑暗的文章，积极地投入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三

1947年1月，《星闽日报》开始筹办，报社地点是现在的台江区中平路牛弓街19号，郑书祥被聘为总编辑。孟起知道后，认为这是一个很特殊又很好的阵地，要长久地占领这个据点，应当办出自己的特色，为人民解放事业尽一份力量。他与郑书祥交换了在国内统区如何办报的看法，共同认为在四周都是反动军、警、宪、特的监视下，要提高警觉性，加强保护色，不能有“过左”的表现，尽量用合法面目出现，揭露不合法事件。他们认为，副刊要活泼，特栏稿件要自己掌握。这个时候孟起对郑书祥的历史已有了解，并根据他到永安四年的表现，提出要他参加城工部的党组织。因为郑

书祥已于1935年在厦门入党，他要求组织上把他在香港的党组织关系（1942年以前）转到福州来，不要再重新履行入党手续。孟起表示同意，并提出在未正式转移之前与他单线联系。从此，他们之间建立了上下级关系，包括政治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业务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

孟起对如何办《星闽日报》有过多次指示。第一，不能打退堂鼓。郑书祥曾说过，实在站不住脚时，打算退回研究院去。孟起批评他说：“这是书生习气，是个人清高打算，不是斗争艺术”，“《星闽日报》是福州的大报纸，中统想控制，军统也想控制（实际上都打进了一些人），你是星系报纸的老报人，又是胡文虎同乡，他们不容易夺去。你当总编辑最合适，有这么好的条件要设法稳住，不可作中途退出的打算”。第二，要伪装自己。写社论、作报道要用“官方”的语言，用民主主义者的口吻去写作。一切都按照“合法”方式办理，不能太露骨，不可让人有机可乘。只要不时说些公道话，反映一些真实情况，揭露一些真相，就是我们的目的。第三，一定要保持民营报纸的特点和本色，也就是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式，寻找机会放一些进步的、人们渴望的东西出去。1947年6月《星闽日报》开始编辑、试版，每期只印五六份，郑书祥不时集几份送给孟起审阅并征求他的看法。看后他认为，副刊编得太呆板，要有漫画、木刻、插



《星闽日报》报头

图。他说，社论写得太露骨容易出事，“不够收敛，何必一开始就显露如此锋芒”。孟起除了严肃地提出在白区办报的策略外，还为星闽日报社推荐了些新人，以充实进步力量。如黄垂庆（黄岑，20世纪80年代曾任福建电视台台长）是他在福安担任《南方日报》闽东版主编时培养的进步青年。他与郑书祥研究后用巧妙的办法，送黄垂庆到星闽日报社当记者。

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下，传播战场消息，揭露腐败政治，如何做到既不犯法，又能透露事实真相，使读者有一个明晰的方向，《星闽日报》采取了打破“中央社”一家独断新闻，开辟多渠道消息来源的方式。如战局、政局的重要消息，除“中央社”电讯外，同时刊登合众社、路透社等英、美、法等国的通讯社消息，透露真实情况让读者进行比较。在版面上设立“经济商情”“新闻之窗”“文教短波”等专栏，多角度反映社情。开辟“读者之声”“社会服务”直接听取大众呼声。利用星系报业集团派驻国内外记者网，报道各地的第一手消息，反映国内战局、时局的重大变化，使广大读者的视野为之开阔。约请国内知名教授、学者纵谈国事，如燕京大学齐思和，北京大学胡适、崔书琴，清华大学张印堂等，他们撰写文章，文风清新，见解独到，大多宣扬进步思想，起到激浊扬清的作用，使读者耳目一新。在关键时刻请本省丁超五、刘通、何遂等名人对重要问题发表看法和意见。以上这些巧妙的包装手法，骗过了敌人耳目，即使他们不愿意看到这些消息，因为都在合法范围之内，也只能干着急。

当时办报纸有个惯例，就是要经常出社论。《星闽日报》也不例外，几乎天天有社论，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国际、军事、教育、金融、物价、华侨等方面内容，大部分是郑书祥亲自执笔，不下几百篇，约占全部社论80%。这些社论如何不被抓住辫子，又尽可能地反映客观事物、揭露矛盾，是一件伤脑筋的事。郑书祥学识

渊博、眼光敏锐、经验丰富，善于打擦边球，与反动当局周旋。在经济方面主要从众所周知的国民党统治区涨价风入手，来揭露官僚资本和四大家族的疯狂掠夺及其罪恶。如1948年8月21日社论《新币与物价》，指出金圆券并无物质基础，暗示会失败。社论发表后，一时银行挤兑，物价暴涨，人言啧啧，不少国民党官员暴跳如雷，要查封报纸。但社论逻辑严密，论据充分，以探讨性质的文章出现，文字上无懈可击。加上胡氏家族出面周旋，终以判罚停刊三天了事。政治方面都是比较敏感的问题，不可能从大局而论，只能从局部问题谈起，在国民党腐败的反动统治层面穿几个洞，以扩见其一般，如1948年10月27日社论《无能！贪污！》。当年国民党官场上贪污成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作者巧妙地借用美国来华特使魏德迈指责国民党官员“贪污无能”的语气来借题发挥，对国民党政权腐败现象进行抨击。在军事方面，郑书祥用失败主义的情调去论述军事战线的失利，用分析形式渗进客观事实的巧妙方式透露国民党军失败与人民解放军胜利，如1949年3月18日社论《从重庆号说起》。重庆号军舰于1949年2月25日凌晨在上海吴淞口举行起义，开往烟台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对此讳莫如深。郑书祥把事实真相公之于众，并且提出军心之所以涣散，实由民心之所向使然；今日之民心，一致要求和平，故欲阻止重庆号事件之再生，唯可循的途径，就是结束战争，谋求和平。这篇社论是配合省议会中地下民盟、进步参议员与国民党斗争的一记组合拳。还有《毕业生失业问题》《为公教人员生活呼吁》《收回香港九龙》《台湾是中华民族》《重视和平的呼声》等教育、社会方面的社论，对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抨击，对唤起民众觉醒发挥了很好作用。在这一条隐蔽战线上，郑书祥等同志置生死于度外，与敌人斗勇斗智，显示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

四

1947年初，为筹备革命经费，城工部发动“米变”“布变”等把敌人的物资变为革命经费。8月31日，孟起因为组织“海关布变”被家里的保姆出卖暴露了身份而被反动派逮捕，关在三关堂便衣队驻处受审。敌人采取严刑拷打、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办法，企图从他的口中得到我党党内信息。但孟起始终对党忠诚，守口如瓶，还做了一位看守的工作，打算越狱。城工部领导也准备了三种方案营救，因种种原因无法实施。敌人给孟起加重脚镣，更换关押场所，更加滥施酷刑问讯，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不吐半点机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孟起虽然肉体受到摧残，但他情绪乐观，关押期间仍设法购买报纸关心政治。敌人对孟起毫无办法，但他又是共产党重要干部、“政治要犯”，在无可奈何之下，于当年11月11日将孟起夫妇押往南京国防部保密局，交由更高一层的特务机关秘密审讯。孟起在福州时，已被敌人折磨得形如枯槁，骨瘦如柴。到南京后，敌人更加残酷，把他们夫妇俩分别关押在男女牢，不准见面，不准看报，在冰天雪地里将他外衣剥光……他仍然不屈服，大义凛然地写下“唯死而已”四个大字，并托人向党组织表示“至死不变，决心如一，个人生死在所不计”，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境界。不幸的是，1949年年初，正当解放战场不断传出捷报，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时，敌人丧心病狂地秘密杀害了孟起同志。时年，他才36岁。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共南京市委批准，孟起的遗像、革命事迹陈列在南京雨花台陵园纪念馆，供后人瞻仰学习。孟起烈士永垂不朽！

孟起被捕以后，郑书祥失去了直接的政治领导和办报上的业务指导。虽然他也感到茫然，但还是因势利导，随机应变，继续坚持斗争，仍按照与孟起相榘的方针和策略坚持下去，特别在社论撰写上更加严谨。到了1948年下半年，星闽日报社还主动增加了支持中共地下党组织创办《大众报》的任务。

五

中共省福中(今福州一中)党支部薛谋略、游德馨、张任生小组,经上级同意,于1948年年底打算办一份地下油印报纸。小组的张任生同志,受党小组指派,经七次探监,找到他的同乡又是他父亲的学生——星闽日报社记者黄垂庆。黄垂庆因“共谍”嫌疑被捕入狱,他拒不承认,被列为未决政治犯。经他写纸条介绍,张任生找到郑书祥的堂弟郑福祥。他是星闽日报社电务室报务员,思想进步,对旧社会不满,经常与黄垂庆谈论时局交流思想。他手上有一台美制12灯电子管收音机,可收到邯郸新华社电台的播音。郑书祥知道后,指示他要大力支持办地下报纸。郑福祥答应供给我们邯郸新华社电讯专稿。不久,经过郑书祥的大力营救,黄垂庆得以保释出狱,安排在星闽日报社资料室搞内勤,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香港《华商报》《大公报》《文汇报》的剪报资料。在此基础上,以我们党小组为核心组织“大众社”办起《大众报》。它是两张八开毛边纸的油印报纸,每期两三百份,内容是解放战争战场上的胜利消息,解放区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喜讯,党对新解放区的政策和党的工商政策,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揭露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消息等,前后共印发12期。还翻印了《新民主主义论》《解放军为何胜利》等十几种小册子。为了躲避敌人的监视和侦察,报社先后迁移了五个地点。《大众报》一经内部分发到市区、农村和游击队,像久旱逢甘露一样,引起很大震动,受到热烈欢迎。

狡猾的伪福建省保安司令部政训处主任万振鹰,搜到一份又一份《大众报》后,认为在严密的新闻封锁下,要获得如此精细的电讯文稿,除非报社或有高档收音机,否则是无法办到的。他早已布置四处监视《星闽日报》,最后他自己带领一帮特务前后三次到星闽日报社查验,郑书祥与他们周旋,由于找不到破绽无法下手。但是他还不死心,仍在暗中追查。事过不久,一群暴徒擅自闯入报社

三楼电务室，要绑架郑福祥，幸好他早已离开未遭毒手。

1949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陈诚到福州，加紧扩军备战，加紧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郑书祥被列为福州文化界第一个捕杀对象。在这危急关头，郑书祥先后将特务要抓捕的郑福祥、黄垂庆疏散去香港，自己坚持到6月，在福建地下民盟组织委员吴修平、周问仑同志安排和掩护下避往香港，旋由乔冠华、饶彰风安排到华商报社任资料室主任兼社论撰稿人。

1950年1月，在星闽日报社职工的强烈要求下，经中共福建省委电召，郑书祥重回福州，主持改组后的《新星日报》，继续担任总编辑，直至同年10月该报停刊。由于孟起牺牲，加上福建城工部冤案影响，郑书祥同志的党籍得不到证明。但他仍然以进步的民主人士身份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福建省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力量。他担任过福建省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福州二中（原英华、陶淑、华中三校合并，今师大附中）校长、省教育厅副厅长、省政协委员。他与省内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在“反右”“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但他不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对党抱有深厚感情，对革命事业矢志不移，表现了一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他先后多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粉碎“四人帮”后，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经过缜密调查，并报省委批准，恢复郑书祥同志党籍，党龄从1935年12月算起。2012年是郑书祥同志百岁冥诞，他的战友黄垂庆和女婿王子韩编辑出版了《郑书祥纪念文集》。该书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好教材，体现了郑书祥同志对党忠诚，热爱人民，理想信念坚定，革命意志坚强。他以渊博的学识、敏锐的眼光、丰富的经验与敌人斗智斗勇，表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作者系福建省政协原主席）

《福建日报》创办初期的老领导们

王仲莘

《福建日报》创刊于1949年8月25日，报社前几任的主要负责人，如杨西光、何若人、孙泽夫、刘岳峰等都来自山东解放区。我是1950年报社创刊一周年才来报社的，与杨西光同志接触时间短，但杨西光同志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杨西光同志到报社时，带来一部美国军用吉普车，但他自己很少坐，他来往于省委和报社之间都是骑自行车。1950年冬天，一天傍晚，我与刘岳峰散步走到南街华侨商店门前，杨西光披着一件蓝大衣、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骑着自行车从南门兜方向奔来，边走边发话：“刘岳峰、王仲莘，回去开会。”那一次研究什么问题已经记不得了，但是60多年过去，我对杨西光同志的印象却永远定格在那幅画面上。至于何若人、孙泽夫、刘岳峰同志，我们是1948年在《胶东日报》认识的。他们都是我的老领导、老上级，也都是我的兄长和恩师，他们对我的关怀、教育和提携，令我终生难忘。



1949年8月25日《福建日报》创刊号第一版